

日本對中政策與兩國關係 展望

川島真

面對當前的嚴峻情勢，中日兩國政府希望看到甚麼樣的中日關係？就現狀而言，兩國政府在實現此目標方面又需要處理哪些課題？

2023年5月七國集團(G7)廣島峰會的領袖公報中提到：「作為G7的合作夥伴，我們各自與中國的關係，在以下的基礎因素方面，將會團結一致」，這闡明了G7成員國共同的對中認識及對中政策，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反映出日本對中政策的理念。例如，關於其基本理念^①：

我們認識到與中國開誠布公打交道，以及直接向中國表達我們關切的重要，我們準備與中國建立具建設性且穩定的關係。我們將依據國家利益行動。鑒於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作用及經濟規模，我們有必要在全球議題及共同關心的領域，與中國進行合作。

「準備與中國建立具建設性且穩定的關係」這句曾獲中日兩國認同的話被列入領袖公報，可證實日本的對中政策的確已延伸到G7的對中政策。

然而，中國向G7提出了強烈抗議。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國—中亞峰會西安宣言〉中明言反對任何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儘管他避免了指名道姓^②。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則對G7干涉中國內政表示強烈不滿及反對，並向東道國日本提出嚴正交涉，只不過該發言人沒有使用「抗議」一詞，而只是使用了「交涉」。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孫衛東後來召見了日本駐中國大使垂秀夫，雙方就此進行了討論。垂秀夫表示，除非中國改變行為，否則今後仍會持續提出關切言論，希望中方能改變其對外態度^③。

如此情況，讓人感到中日關係似乎正在嚴重惡化。然而，就在G7廣島峰會召開之前，中日國防首長舉行了第一次「國防熱線」電話會談(中日國防當局間的直通電話)^④，中日兩國還在2023年2月簽署了多達十七份關於脫碳的合

作協議^⑥。中日之間一方面呈現出緊張關係，另一方面又在各種議題上進行着合作。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樣的關係？本文將就當前處於不同於過往局面的中日關係進行探討。

一 日本的「打交道」政策？

如前所述，在G7廣島峰會的領袖公報中，關於與中國的關係，有着如下敘述：「我們認識到與中國開誠布公打交道，以及直接向中國表達我們關切的重要，我們準備與中國建立具建設性且穩定的關係。」「打交道」一詞和「準備」一詞被搭配在一起使用，藉此表現出一種有條件式的向中國讓步的姿態。

然而，美國在2010年代後半已經明確放棄了對中國進行所謂的「打交道政策」(engagement, 又稱「接觸政策」)，將「競爭」作為對中政策的核心原則，採取以「不衝突」、「必要時合作」為基調的政策，而「競爭」則意味着會有贏家和輸家。中國方面，其對美政策則是以建立新型大國關係作為目標，現在也和美國一樣，採取以「與美競爭」為中心的政策。那日本的情況又是如何呢？

一方面，日本的對中政策在最初並沒有一個相當於美國「打交道政策」的理念。不過，按一般普遍理解，日本採行的是將政治與經濟分離開來的所謂「政經分離」手法，特別是在經濟方面，試圖將中國納入資本主義的秩序之中。即使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際，比起孤立中國的做法，日本仍採取了繼續將中國拉進資本主義陣營的政策。

日本不曾將中國國內的政治體制視為問題，也沒有要求過中國改變其政治體制。在1972年9月的《中日聯合聲明》中，有「中日兩國儘管社會制度不同，應該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關係」的字句^⑦，這意味兩國相互接受彼此政治體制的不同。另外，1978年8月簽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明言：「確定彼此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而不訴諸武力或武力威脅」，「任何一方都不應在亞太地區或其他地區謀求霸權，並反對任何其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⑧。然後，1998年11月的《中日聯合宣言》重申：「雙方不在本地區謀求霸權，不行使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主張以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糾紛。」^⑨此外，2008年5月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更明確寫道：「雙方確認，兩國互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⑩

日本政府避免介入中國的內政問題，也避免使用直接將中國說成「威脅」的表述，並且呼籲中國不要在區域內鼓吹霸權主義。當然，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正告日本不要再對中國發動戰爭等，這在建交初始之際是有其意義的，就算是在今天，中國仍可能意識到包括日本在內的工業化國家給其帶來了威脅。

另一方面，日本過往沒有明確使用「打交道」這樣的字眼，而是呼籲中國不要挑戰現有的秩序。《中日聯合宣言》有「建立公正與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

秩序，謀求21世紀有一個更加鞏固的國際和平環境，已成為國際社會的共同願望」等內容，《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則提到「為進一步理解和追求國際社會公認的基本和普遍價值進行緊密合作」，普遍價值成為雙方共通點，中日雙方已經達成為國際秩序而合作的共識。

2010年代，中日關係極度惡化。這是以2008年12月中國公務船首次進入釣魚台列嶼（日方稱「尖閣諸島」）領海為開端，然後是2010年中國漁船與日本巡邏船的相撞事件，以及2012年日本政府對釣魚台部分島嶼的私人土地實施國有化等事件導致的結果。從2014年起，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持續改善對中關係。安倍政權雖然透過強化對美關係、加強軍事能力等動作來提升對中阻嚇力，但同時也在許多方面推動着與中國這個經貿關係最為緊密的國家改善關係。這個態勢，從奧巴馬（Barack Obama）任期末到特朗普（Donald Trump）時期美中關係進入緊張狀態後都沒有改變。

2018年10月，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在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發表演講強烈譴責中國^⑩，但在同一個月，安倍晉三訪問中國並與習近平會面，給人留下了日方意在改善對中關係的印象。2018年5月4日，習近平成為第一位與日本首相舉行電話會談的國家主席，展現出推動改善對日關係的姿態。從這以後，習近平在2020年9月25日與首相菅義偉、2021年10月8日與首相岸田文雄也舉行了電話會談。持續與日本新任首相保持電話會談，表示習近平並未撤回改善對日關係的指示，仍保持着改善對日關係的政策。當然，中國在日本周邊的軍事政策和海上軍事動作，還有釣魚台列嶼周邊水域的海警活動，即便存在對日關係改善指示，今後仍可能持續升級。

二 岸田政權的對中認識

岸田政權出自日本自由民主黨內名為「宏池會」的派閥。宏池會是前首相大平正芳出身的派閥，在自民黨中被視為重視與中國建立關係。岸田文雄本身擔任廣島縣日中友好協會會長，外相林芳正也曾擔任過日中友好議員聯盟會長。因此曾有人預測，不同於「清和會」派閥的安倍政權及菅政權，岸田政權會採取更接近中國的政策。正因為安倍政權被認為對中態度強硬，所以外界對其接近中國不會有太多疑慮，反倒能夠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然而，岸田政權受到國民高度質疑，要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並不容易。

眾所周知，如同日本內閣府2022年末的民意調查結果所示，日本國民有80%以上對中國感受不到親近感^⑪。若日本過於接近中國，會影響到政權的支持率。然而，如同言論NPO的調查所示，六成以上的日本國民認為中日關係重要，經濟關係被視為原因所在^⑫。透過上述民調，可看出雖然日本民眾對中國抱持較否定的觀感，但同時卻又重視與中國的關係，尤其是在經濟方

面。因此，作為日本政權，首先要展現出對中國的強硬態勢，接着是鞏固與美國，然後是澳洲、西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等美國同盟的國家或組織，還有印度等具有戰略意義的重要國家之間的關係，最後才摸索與中國的關係改善。這一戰略思維對岸田政權而言也是相通的。

此外，隨着中美間的「競爭」關係激化、在新冠疫情和俄烏戰爭下逐漸加劇的對中批判，還有以管理軍事和民用先進技術為代表的「經濟安全」受到重視等狀態之下，要在與中國保持經濟關係的同時，處理好彼此政治關係上的的是非非，亦即做到所謂的「政經分離」，就變得更加困難。然而「政經分離」是日本對中政策的基本理念，因此岸田政權面臨如何重新規劃對中政策的課題。中國軍隊和海警在日本周邊的活動，從2010年代末以後就變得更加活躍；要求岸田政權處理這些來自中國的軍事壓力的聲浪也愈來愈大。

2021年10月4日，岸田內閣成立。8日，岸田文雄和習近平舉行了電話會談。岸田文雄上任時這個慣習仍舊被延續了下來，這顯示中國沒有改變其改善與日本關係的基本政策。在這場電話會談中，岸田文雄就中日關係提出了建立「具建設性且穩定的關係」，習近平對此也表示贊同^⑬。建立「具建設性且穩定的關係」成為了貫穿岸田政權對中政策的理念，並在2023年5月G7廣島峰會的領袖公報中得到了承繼。

2021年12月6日，岸田文雄在國會發表施政方針演說，關於對中政策，他指出「對中國該主張的就主張，強力要求中國採取負責任的行動，同時也會在共通課題上合作，以建立具建設性且穩定的關係為目標」^⑭。一方面，這裏所使用的「合作」一詞，比起菅義偉施政方針演說中使用的「聯繫」一詞^⑮，展現出一種更為積極的姿態。另一方面，2021年11月中日外長電話會談時，林芳正對釣魚台列嶼局勢，東海、南海、香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等情況表示嚴正關切，同時指出台海的和平與穩定至關重要，這樣的表態便是岸田政權考慮到上述「該主張的就主張」的印證^⑯。

然而，俄羅斯2022年2月入侵烏克蘭，使得國際局勢發生了重大轉變。日本強烈抗議俄羅斯「以武力改變現狀」，當認識到這種情況也可能發生在東亞後，日本加入了對俄羅斯的制裁，以便未來東亞若有不測風雲，也能取得國際社會的支持。岸田文雄在3月16日的記者會上，被問及在國會呼籲中國採取負責任的行動一事，他表示具體方法是「利用各種對話的機會，確實強調促使國際秩序穩定的重要性」^⑰。岸田文雄在這裏指出了對話的重要性。他在6月15日的記者會上再次提到這一點：「為了守護區域的和平與穩定，該向中國主張的就要主張，要求中國採取負責任的行動。同時，我們將就包含諸多懸案在內的議題進行對話，並就共通課題進行合作。這就是我所提倡的『新時代的現實主義外交』。」^⑱在這個時期，日本盛行所謂「中俄團結」的論調^⑲，傾向將中國與俄國視為一體，導致中日關係變得極為緊張。儘管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但幾乎見不到甚麼紀念活動。只不過岸田政權避

開了點名批判中國，或是直接指責中國就像俄羅斯一樣等做法。岸田文雄在6月10日的香格里拉對話表示：「我本身有這樣一種強烈危機感，『今日的烏克蘭可能就是明天的東亞』」，但他並沒有點名中國²⁰。

2022年9月29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紀念日，為此，8月31日，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洲局長船越健裕與中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劉勁松舉行會議，開始了雙方「最低標準」的關係改善。9月27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中彈身亡後舉行國葬，出席這場葬禮的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萬鋼。萬鋼並不是中國共產黨員，一般認為之所以會選派他出席是考量到對日關係稱不上良好的緣故。萬鋼到了日本後，禮貌性拜會了官房長官松野博一，雙方共同認識到「在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的契機之下，必須為實現兩國領導人的共識，即建立『具建設性且穩定的中日關係』共同努力的重要」²¹。

11月17日，中日兩國在出訪地泰國舉行了一場領導人會議。此時習近平將繼續邁入第三個任期的態勢已經明朗。岸田文雄表示，「目前，中日關係有各種合作的可能性，同時也面臨着許多課題和懸案」，但他也說，「重要的是，中日兩國都是對區域及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繁榮負有重要責任的大國，正因為存在着課題和懸案，所以才需反覆進行坦誠的對話。在全球性的問題上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一同行動，就共通課題展開合作，在建立『具建設性且穩定的中日關係』的共同座標上，透過雙方努力一同加速前行」。除了重新回到傳統對中政策的軌道上，也提到了作為負責任的大國應一同行動與合作。對此，習近平表示，「中日關係存在廣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潛力，中日關係的重要性沒有改變。願與岸田總理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²²。

像這樣，岸田文雄堅持他上任之初的基本方針，繼續積極的對中政策，嘗試在雙方之間搭建「具建設性且穩定的中日關係」。但是，即使日本避免了直接批判中國，以美國為代表的工業化國家的對中政策卻變得愈來愈強硬，尤其在軍事安全以及軍事和民用先進技術方面，情況特別顯著。堅定維護與加強美日同盟，徹底反對「以武力改變現狀」，也是岸田政權的基本政策，這反映在國家安全政策中。

12月16日，岸田內閣與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制訂了所謂的「安保三文書」（〈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防衛力整備計劃〉）。其中，〈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避免將中國稱為「威脅」，但使用了諸如「中國目前的對外態勢及軍事動向令我國和國際社會嚴正關切」、「在確保我國的和平與安全、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穩定，以及加強奠基於法治基礎上的國際秩序方面，我們面臨未曾有過的重大戰略挑戰」等表述²³。

此外，〈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還列舉出許多對於中國的批判：第一，「中國正在強化與俄羅斯的戰略合作關係，試圖挑戰國際秩序」，而這也與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使用的敘述——「儘管美國仍致力於扛起管理國家間競爭的責任，但

中華人民共和國懷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且愈來愈有能力重塑國際秩序，將全球競爭環境導向對其有利的條件」——互相呼應²⁹。第二，「國防支出不斷增升，在欠缺足夠透明度的狀態下，廣泛且急速地增強包括核武及導彈在內的軍事力」，中國在低透明度的狀態下持續發展軍事能力，受到日方批判。第三，在經濟方面和全球規模的課題上，「國際社會強烈要求中國作出符合其國際影響力的更進一步努力」，但中國被批評為「並未參加主要官方債權國平等參與的國際框架，金融發展及相關活動的實際狀況亦缺乏足夠的透明度」。此外，「正在強化戰略舉措以建立在經濟方面的安全，利用他國對中國的依存，在經濟上對其施加壓力的案例」等問題也被指出。該文件也對台灣海峽問題表達了強烈的關切：「不只是包括我國在內的印太地區，對於台海的和平與安定，整個國際社會的關切在急速增加中。」而「台海的和平與安定」，也是被美日兩國和G7成員國經常採用的文句。

綜上所述，雖然岸田政權的對中政策方針包含了「建立具建設性且穩定的關係」、「願在共通課題上合作」等理念，但在軍事安全方面，岸田政權也將中國視為「日本和國際社會嚴正關切」的對象、「未曾有過的最大戰略挑戰」。因此，如何化解這兩項政策方針之間的矛盾，並在進行整合的同時推展中日關係，便成為了岸田政權的課題。

三 提升阻嚇力與持續直接對話、問題控管

(一) 軍事阻嚇力的強化

2022年12月，岸田文雄公布「安保三文書」的同時，明確表示將在五年內確保43兆日圓的防衛經費。這相當於目前防衛經費的1.5倍，中國對此表示強烈反對。然而，自俄烏戰爭以來，俄羅斯在日本周邊的軍事活動變得活躍，還可以見到中俄兩國軍隊的許多聯合演習和聯合活動。中國的國防能力持續增強，北韓的導彈試驗與核武威脅也日益增長。這是導引日本政府大幅強化防衛能力的原因，而其中也有因應美國要求的原因存在。

2023年1月，在新的軍事安全保障政策框架下，日美召開了「2+2」會談³⁰。這場會談點名了中國並對其進行強烈批判。首先，「日美雙方一致認為，中國以外交政策為基礎，旨在為自己利益而重塑國際秩序的行動，是同盟及整個國際社會嚴正關切的事，也是印度太平洋地區及整個國際社會中最大的戰略挑戰」。此外，還表示「再次表明強烈反對中國逐漸增強力道於試圖透過武力單方面改變東海現狀」，「重申對國際社會的安全與繁榮而言不可或缺的要素——台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敦促兩岸問題的和平解決」。

其次，在軍事安全合作方面，「美日雙方都決定深化兩國之間的合作，以便在與美國密切協調的情況下有效運用日本的反擊能力」，承諾在保留日本反



岸田文雄登上2023年5月下旬《時代》(Time)雜誌封面，該期標題原來是「將日本改造為軍事強國」，後在日本政府抗議下網絡版標題改成「日本的選擇」。

不意味着與中國「敵對」。美國也是以與中國「競爭」作為基調，避免衝突，該合作時就合作；岸田政權的對中政策理念也如同上述：「對中國該主張的就主張」，「以建立具建設性且穩定的關係為目標」。

(二) 中國風險與中日經濟關係

如何在提高軍事阻嚇力的同時實現這些政策理念，特別是在兩國經貿關係緊密的情況下？對日本而言，這其實就意味着要與中國建立一種新的關係。

談到經濟方面，2010年前後中日在釣魚台問題上的對立升溫之際，在中國投資的日本企業就已經採取了「中國加一」(China+1)政策、「當地生產、當地消費」等對策。日本對中國的情感極度惡化發生於2010年前後，當時日本對中國產生了極大的戒心。美國的對中認識明顯產生變化的時間點則比日本晚了五年以上。由於日本的對中認識已經到了極度惡化的程度，即使在新冠肺炎期間也沒有發生很大變化。正因如此，日本企業界對中國風險有所反應的時間點也很早。其結果是，日本企業把銷往全球市場的生產線轉移到中國境外，而留在中國的生產線則為中國市場生產；還有，零組件從中國採購，在中國生產，然後賣給中國市場——採用了「當地生產、當地消費」方式。這也是為甚麼日本企業雖然在某些方面同意美中競爭下的「經濟安保」構想，但還是強烈傾向抱持觀望的態度，想要明白具體上到底要管控甚麼，以及要達到甚麼程度。

擊能力的基礎上推動美日合作。另外，「日美雙方都承諾要深化在太空相關能力方面的合作」。在此基礎上，關於太空領域，「日美雙方都認為對太空的攻擊、來自太空的攻擊或在太空之中的攻擊都是對同盟安全的明確挑戰，並確認在一定情況下，該攻擊行為可能導致援引《美日安保條約》第5條」，太空議題就這樣被納入美日同盟的框架內。

這些都清楚顯示出日本將加強對中國的軍事阻嚇力。在此處有兩點需要注意：第一，加強軍事阻嚇力的前提是同時進行直接對話，這也包括了向對方傳達阻嚇的意圖。第二，加強軍事阻嚇力的做法終究是為了「和平」，並

對日本企業產生強烈影響的，反而是2022年3月日本製藥公司的幹部在北京被拘留的事件。像這樣商業人士被拘留的案件，成為日本企業與中國互動時一塊很大的絆腳石。許多日本企業對於大幅擴增與中國的生意業務態度消極，但它們對於大幅消滅有利可圖的中國生意業務，態度同樣消極。因此，日本企業界雖然試圖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與中國的關係，但卻沒有達到想去要求岸田政權改善對中關係的程度。然而，對於後疫情時期的經濟復蘇來說，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很重要，前述民調也顯示八成以上的日本民眾對中國沒有好感，六成以上的日本民眾認為中日關係很重要，其理由被認為在於經濟。這就是為甚麼岸田政權被要求在經濟方面改善與中國的關係，哪怕只是逐步改善。

(三) 在G7廣島峰會上的一個解答

正如前文所討論的，日本的對中政策面臨着一道新的難題。這道難題就是如何在「增強軍事阻嚇力」的同時，還能實現對中國提出主張及要求、「在共通課題上合作」、「建立具建設性且穩定的中日關係」等政策理念。雖然這兩者乍看之下相互矛盾，但如同前述，提高軍事阻嚇力的目的在於「和平」，所以日方才呼籲與中國直接對話，透過強調可謂「教科書式」的阻嚇理論，邏輯上來說能在某種程度上達成整合。不過，中國方面是否會接受，則是未知之數。

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在G7廣島峰會與其他工業國就對中政策提出了一個解答。領袖公報以「關切」作為前提，同時還準備進行早已被美國放棄的「打交道政策」；此外，也確認了將關切之意直接傳達給中國的重要性，同時提及與中國的合作。有鑒於在同一份文件裏對俄羅斯的強烈批判，可以看出不同於此前的「中俄團結」論調，這是將中國與俄羅斯區別開來的聲明。

另外，領袖公報還提到「我們的政策方針，不是為了傷害中國，也不是為了阻撓中國的經濟進步和發展。成長的中國遵循國際規範行事，是全球關切的事項」，這是針對中國對西方工業化國家試圖要在中國推動「顏色革命」有所警戒之情況的回應。「我們不是在脫鉤 (de-coupling) 或採行內向。同時，我們認知到，經濟方面的強韌性，必須去風險化 (de-risking) 和多元化。我們將單獨和集體地採取措施，以投資我們本身的經濟活力。我們將減少在重要供應鏈中的過度依存現象」，公報沒有使用「脫鉤」，而是改用「去風險化」一詞。這與其說是呼籲中國放下戒備，不如說是在呼籲中國建立合作關係。對於俄烏戰爭也是如此，「我們呼籲中國向俄國施壓，使其停止軍事侵略，並立即、全面、無條件地從烏克蘭撤軍。我們力促中國支持立基於領土完整和《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和宗旨之全面性、公正且永久性的和平，包括透過與烏克蘭的直接對話」，可見日方敦促中國在停止戰爭方面給予合作。

當然，公報中還可以看到許多對中國的關切。例如對東海和南海局勢的關切、強烈反對「任何以武力或脅迫方式改變現狀的單方面嘗試」，也包括以強迫勞動問題為代表的西藏和新疆等地區的人權狀況，以及對《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的承諾。而關於最重要的台灣問題，公報內容有一個段落出現與去年峰會不同的表述，「我們重申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它對國際社會的安全與繁榮不可或缺。G7成員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基本立場沒有改變（包括表明過的一中政策）。我們呼籲和平解決兩岸問題」。這裏新增了「不可或缺」（indispensable）一詞²⁶。中國方面則對這一份提到台灣、香港、新疆問題的公報發出了強烈抗議，認為是對其內政的干涉。

G7廣島峰會的公報，可以說是為上述難題提供解答的嘗試。儘管有所「關切」，但也包括了準備好與中國「打交道」這樣奮力向前的表達。雖然加強了軍事阻嚇力，但日本和其他工業化國家也表現出與中國建立關係的姿態。不過，中國對此沒有作出肯定的回應。

四 東亞中的日本

日本就像這樣找尋對中政策難題的解答，以及與其他工業化國家分享其政策理念；也就是在軍事安全、秩序和價值觀方面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但同時闡明了直接對話的必要性，並摸索如何在全球關切的課題和經濟方面進行合作。

岸田政權在俄烏戰爭期間加入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採取了與其他工業化國家一致的立場。這導致日俄關係的惡化，俄羅斯開始更頻繁地和中國在日本周邊進行聯合軍事行動。這樣一來，似乎就更顯得日本比過去更大程度地與歐美工業化國家步調相同。然而，在對中政策方面，日本對於是否也要與其他工業化國家完全一致，則是有所猶豫。這就是日本對中政策的悖論。

具體說明的話，第一，日本和中國互為鄰國。正因如此，中日兩國有着深厚的歷史淵源，在人員、物質方面的交流也極為密切。此外，兩國還有七十多年前的戰爭記憶。無論是台灣發生危機或戰爭，抑或是中美爆發「衝突」的情況，日本都有可能處於最前線。這就是為甚麼「和平」對於日本來說格外重要。202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署四十五周年，該條約的第一條第二款內容為「締約雙方確認，在相互關係中，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這一前提需要得到重新確認。

第二，不只是中國，俄羅斯和北韓也是日本的鄰國。處於這種情況的工業化國家就只有日本而已，或是說就只有日本和南韓而已。對於擁有這些鄰國的日本而言，一方面必須與歐美工業化國家採行相同步調，以尋求相關的合作，但另一方面的問題是，這些國家並非與中國等國互為鄰國，採取與它們完全相同的政策是否真的可行呢？

這兩點也是日本對中政策很大的難題。雖然日本採取與其他工業化國家一致的行動以尋求合作，但只有日本與中國，以及與北韓、俄羅斯互為鄰國，這是一個日本必須考量的因素。因此，與其他工業化國家相比，日本將迫切需要更多的聯絡機制和阻止局勢升級的機制，以及設置更多的國家元首或部長和高級官員熱線電話。

如上所述，日本的對中政策內含多項難題，給這些難題找到解答並非容易的事。有些事情表面上看起來像是正確答案，但實際執行時卻可能窒礙難行。然而，把現階段日本的對中政策，理解成綜合上述多項難題在內的一種政策複合體，應該是可以的。日後如果這些難題演變成更重大或是更嚴重的矛盾，那麼日本將會陷入困境；對日本來說，眼前目標就是維持現狀，不要讓難題升級，並設法於其中取得平衡。

此外，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應該會有這樣的感受：日本的政策不斷地在提升威嚇，有時又會願意改善關係，但常常很快就出現矛盾言行，所以日方到底想要如何處理中日關係，着實令人感到霧裏看花。目前，中日之間對於世界的認識，以及彼此間的相互認識，是大相逕庭的，就這層意義來說，互相理解對方的政策意圖及看法，便顯得格外重要。在這個意義上，本文若能對如何理解日本的對中看法以及就其對中政策發揮一些作用，實感甚幸。

陳柏傑 譯

註釋

- ① 〈G7廣島峰會領袖公報〉(2023年5月20日，日語暫譯版)，日本外務省網，www.mofa.go.jp/mofaj/files/100507034.pdf，下引不再另註。
- ② 〈中國—中亞峰會西安宣言〉(2023年5月19日)，中國外交部網，www.mfa.gov.cn/zyxw/202305/t20230519_11080194.shtml。
- ③ 〈外交部發言人就七國集團廣島峰會炒作涉華議題答記者問〉(2023年5月20日)，中國外交部網，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202305/t20230520_11080726.shtml、〈垂大使對外交部副部長孫衛東提出的交涉進行反駁〉(2023年5月21日)，日本國駐華大使館網，www.cn.emb-japan.go.jp/itpr_zh/00_000485_00223.html。
- ④ 〈中日國防首長使用「中日國防當局間的熱線」進行首次通話〉(2023年5月16日)，日本防衛省網，www.mod.go.jp/j/approach/exchange/area/2023/20230516_chn-j.html。
- ⑤ 〈舉辦第16屆中日節能·環境綜合論壇(成果摘要)〉(2023年2月11日)，日本經濟產業省網，www.meti.go.jp/press/2022/02/20230211002/20230211002.html。
- ⑥ 《日本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共同聲明》(1972年9月29日)，日本外務省網，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nc_seimei.html。
- ⑦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和平友好條約》(1978年8月12日)，日本外務省網，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nc_heiwa.html，下引不再另註。
- ⑧ 《中日關於建立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的聯合宣言》(1998年11月26日)，日本外務省網，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nc_sengen.html，下引不再另註。

- ⑨ 《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2008年5月7日)，日本外務省網，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visit/0805_ks.html，下引不再另註。
- ⑩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s Remarks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s China” (4 October 2018), www.hudson.org/events/1610-vice-president-mike-pence-s-remarks-on-th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s-china102018.
- ⑪ 〈關於外交的民意調查一覽〉，內閣府網，<https://survey.gov-online.go.jp/index-gai.html>。
- ⑫ 〈第18回中日共同世論調查(2022年)結果〉(2022年11月30日)，言論NPO網，www.genron-npo.net/world/archives/13950.html。
- ⑬ 〈中日領導人電話會談〉(2021年10月8日)，日本外務省網，www.mofa.go.jp/mofaj/a_o/c_m1/cn/page1_001056.html。
- ⑭ 〈第二百七回岸田內閣總理大臣在國會發表施政方針演說〉(2021年12月6日)，首相官邸網，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1/1206shoshinhyomei.html。
- ⑮ 〈第二百三回菅義偉內閣總理大臣在國會發表施政方針演說〉(2020年10月26日)，首相官邸網，www.kantei.go.jp/jp/99_suga/statement/2020/1026shoshinhyomei.html。
- ⑯ 〈中日外長電話會談〉(2021年11月18日)，日本外務省網，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1_000637.html。
- ⑰ 〈岸田內閣總理大臣記者會〉(2022年3月16日)，首相官邸網，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2/0316kaiken.html。
- ⑱ 〈岸田內閣總理大臣記者會〉(2022年6月15日)，首相官邸網，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2/0615kaiken.html。
- ⑲ 例如，2022年12月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戰略〉認定中國和俄羅斯都是「(可能)用武力來改變現狀」的國家。參見〈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的全文〉(2022年12月16日)，《日本經濟新聞》網，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167XU0W2A211C2000000/。
- ⑳ 〈岸田總理在香格里拉對話(亞洲安全會議)的主旨演講〉(2022年6月10日)，首相官邸網，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2/0610speech.html。
- ㉑ 〈萬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向松野博一官房長官表敬〉(2022年9月29日)，日本外務省網，www.mofa.go.jp/mofaj/a_o/c_m1/cn/page1_001327.html。
- ㉒ 〈中日首腦會議〉(2022年11月17日)，日本外務省網，www.mofa.go.jp/mofaj/a_o/c_m1/cn/page1_001413.html。
- ㉓ 〈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的全文〉，下引不再另註。
- ㉔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12 October 2022), 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 ㉕ 〈美日安全保障協議委員會(美日「2+2」)(摘要)〉(2023年1月11日)，日本外務省網，www.mofa.go.jp/mofaj/na/fa/page4_005748.html，下引不再另註。
- ㉖ 2023年G7峰會領袖公報英文版參見“G7 Hiroshima Leaders’ Communiqué” (20 May 2023), www.mofa.go.jp/mofaj/files/100506875.pdf；2022年峰會公報參見“G7 Leaders’ Communiqué” (28 June 2022), www.mofa.go.jp/mofaj/files/100364051.pdf。